

“囚服禁令”在细节上体现司法公正

处于同样的法律程序阶段,身份也是相同的,被告人就不该被贴上不同的“标签”。对被告人着装出台统一规定,反映出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价值取向,而司法活动中的公平正义,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。



QILU EVENING NEWS

齐鲁晚报

www.qilwb.com.cn

本报地址
济南泺源大街6号

邮编
250014

传真(0531)
86993336 86991208

报纸发行(0531)
85196329 85196361

报纸广告(0531)
82963166 82963188
82963199

差错投诉
96706

发行投诉(0531)
85196528

邮政投递投诉
11185

即时互动平台



“壹点”官方APP



新浪官方微博
weibo.com/qilwb



齐鲁晚报微信
qilwanbao002



读者服务中心
家有难事找晚报
96706
www.qilwb.com



评论员观察

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召开关于《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》新闻发布会。《意见》提出,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,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、马甲、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。

消息一出就成为热议的焦点,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庭审时的着装问题,也显示司法机关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迈出了新的一步。这里面既有对身为犯罪嫌疑人的被告人人格尊严的保护,同时也彰显了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法治原则。

公民论坛

根除档案“整容”需综合施治

□郑端端

目前,各级组织部门正在对干部人事档案分级、分批展开系统专项审核,各级别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档案均将纳入审核范围,直接向干部人事档案造假乱象“亮剑”。(2月26日新华网)

近年来,干部档案造假案件时有发生,在一些机关单位档案造假甚至成为公开的秘密,“年龄越填越小、工龄越填越早、学历越填越高、身份越造越假”。这样做无非是为了“谋位子、图帽子、争面子”。

干部档案是记载干部基本信息、政治思想、业务能力、工作表现、工作实绩等内容的文件材料,

在人们的意识里,囚服等带有监管机构标识的衣服,本身就意味着“有罪”,比如身着蓝白条纹衫的人,就常被调侃成“刚出来的”。在2011年开庭的季羡林遗产案中,被告人王如在出庭时就因拒穿号服与法警发生争执。很明显,那种让还未定罪的嫌疑人身着囚服等出庭受审的做法,实际上反映出有罪推定的思维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最高法发布这项“囚服禁令”,保护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意图不言而喻。

其实早在2013年,最高法就已经有过类似要求,但各地法院在执行中的标准不尽相同,在此之前的一些庭审现场,也能见到涉嫌犯罪的被告人着便装出庭,但更多的被告人还是以“罪犯”的形象出现。这难免给人一种区别对待的感觉,也

容易让公众产生困惑。像一些因贪腐落马的高官,或是房祖名这样的明星,他们受审时身上的便装就很容易被视为特权的象征。既然处于同样的法律程序阶段,身份也是相同的,被告人就不该被贴上不同的“标签”。因此,对被告人着装出台统一规定,反映出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价值取向,而司法活动中的公平正义,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。

或许正是因为起到了“以小见大”的作用,在意见全文中并不起眼的“囚服禁令”,却受到了舆论相当多的关注,这种形式上、细节上的改变,也见证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。相信很多人都有感触,二三十年前常见的“罪犯游街”,如今已销声匿迹;警方查处卖淫嫖娼时的现场画面,也不再“高清无码”了……很多

时候,普通人对法治的认识,就是从这些细节中得来,在细节上强化人权司法保障,也有助于把法律的权威内化为人们的真诚信仰。

在法治中国这个大的议题上,习近平指出要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。这里面既有包含审理结果在内的实质正义,更离不开规范各项司法活动的程序正义,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,往往也是更容易实现的。因此,我们乐见法庭上出现更多类似的程序上、细节上的改变,就像河南等地试点将法庭布局改为“控辩审”三方格局那样,更好地保护了被告人的辩护权,对司法机关运用法律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也就更有利于出现符合正义的审判结果。

□崔滨

再把时间拨回除夕之夜,已经成为中国“新民俗”的央视春晚,今年一改惯例,将最能言说时代风貌,最能吸引眼球的喜剧语言类节目数量增加到了10个,而且在这10个相声小品之中,涉及时下最为百姓关注的“反腐”话题的,又有3个。

新华社舆情频道早在9日央视春晚尚在彩排时就专门发布监测日报称,“反腐相声讽刺力度之大,涉及题材之敏感,堪称央视春晚30年来之最,让网友表示十分期待。”

只是,希望越大,失望也就越大。随着讽刺国家公职人员不思全心全意服务民众,一门心思溜须拍马走捷径的《投其所好》;批判一味推崇权力勾兑,认识不同圈子的人好办事的《圈子》;以及被寄予厚望的向经不住诱惑受贿收钱、收车、收房、收情妇之后,还为此找借口的贪官开炮的《这不是我的》等相声小品依次揭开庐山真面目,“反腐相声不好笑”的观感,成为第二天舆论集中思考的热点。

凤凰网对此专门进行了网络调查,得出了参与调查网友中超过六成认为反腐喜剧讽刺力度不够的结论;并据此在其《洞见》评论栏目中亮明观点:所谓的反腐尺度30年来最大,仅仅是基于数量而不是质量而言的。“从内容上来看,仅仅把矛头指向了小科长级别类的小人物,远比我们现实中真实的腐败情况要弱化太多,而且还不必将反腐的伟大功绩归于大领导身上,这违背了讽刺类节目的初心。艺术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,但羊年春晚的反腐喜剧却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低于生活。”

该文作者、文化研究学者葛璐这一态度鲜明的评论,得到了《人民日报》旗下微信评论订阅号“侠客岛”的遥相呼应,其评论员司徒格子撰文称,曾诞生过《宇宙牌香烟》、《打扑克》、《巧立名目》等经典讽刺权贵之作的春晚,如今越来越注重举国上下其乐融融,所谓“既要好笑,又要稳妥”,长此以往,只能是让“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处处雷区。说反腐,不敢给力;陷入不知道该骂谁的尴尬状态。”

在《中国周刊》央视春晚之后第一时间对《这不是我的》表演者苗阜、王声的专访中,作者闫小青借采访者之口,委婉地道出“侠客岛”对反腐相声无法打动人批评的原委:“上央视春晚,不管什么节目,首先

考虑的是政治思想,符不符合政策宣传口径。导演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开始过于强调相声的政治正确。”这使得相声小品在讽刺时政现象时,不得不模糊地处理,“固然保证了政治正确,却让作品的力度和‘笑果’也跟着模糊了起来。”

至此,一直是传说从未被证实的“春晚尺度”之说,终于经由“反腐喜剧”的讨论,被舆论所关注,学者熊丙奇在《北京青年报》撰文称,书于文牍的“尺度”虽然没有,但“创作者内心的尺度多年来已潜移默化形成,而且还会自设尺度,以至于今年骤然尺度放宽,相声小品作者们还无法适应。”

而此次央视春晚对反腐问题的深度关切,则被《沈阳日报》评论为这是“新常态”下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创新,在文化领域中的表现:“反腐相声上春晚,是对语言类节目规律的回归,也是反腐业已成为新形势下一种主流文化的必然反映。”

所以,正如《法制晚报》评论的,“春晚开反腐相声的先河,有人不满足了,觉得不够锐利,不好笑。但这并不能否定反腐相声的一切。各类对官场不良现象讽刺的作品,已经绝迹多年。如今重新出现,应该被看做是个巨大的变化,搁在春晚这个背景下,也可以说是有勇气的。”

效果不佳,力度不够,留着当以后进步的余地,关键是能开个头,万事开头难。头开了,以后的表演就会顺畅得多。而且关键是,春晚可以说了,以后别的地方也可以说,说得多了,优秀的、让人难忘的作品就可能出现。”

由此联想到《新京报》在《这不是我的》表演者苗阜、王声专访中挖出的,“中纪委工作人员曾发短信称‘需要帮助就说话’”,可见以喜剧艺术的形式表现反腐,正是中纪委眼下继续深化反腐,多管齐下、多措并举反腐倡廉信心与决心的体现。

正如时评作者梁江涛期待的,相声小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公众喜闻乐见,容易引发共鸣,用其来折射监督者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,不仅寓教于乐,更可以赢得民心,理应让文艺创作放下包袱。

谁的胆子都是练出来的。有了先行者,自然会有人跟上,一浪高过一浪,反腐相声既有讽刺力度,又幽默好笑的日子,也就不远了。

■本版投稿邮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



闻风而动

据新华网报道,湖北十堰市人社局局长孙照军在“清房改革”中玩起了“搬进搬出”游戏,为应付检查搬到小办公室,“风声过后”又搬回超标办公室。近日,孙照军因违规使用办公用房被免职。

漫画/曹一